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

牛鹏涛 苏 辉 编

 科学出版社

非外保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

牛鹏涛 苏 辉—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首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的成果为主，共收录 37 篇论文，汇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就出土文献与周汉古籍、先秦秦汉史、考古新发现与古代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学术史重写及早期思想史理论与方法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本书适合历史学、考古学专业的师生及对中国历史、古代文明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牛鹏涛, 苏辉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3
(荔园国学丛书/景海峰主编)

ISBN 978-7-03-056205-0

I. ①中… II. ①牛… ②苏… III. ①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963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周 爽 / 责任校对: 王晓茜 樊雅琼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 1/2

字数: 430 000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序

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始于 1984 年，在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兴起之前，已着先鞭。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1983 年 9 月即诞生了特区的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并在建校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当时，国学一词并不流行，国学之说尚有禁忌，为什么会用这个概念来命名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这就要从它的创办人汤一介先生说起了。汤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他在 80 年代初赴美访学时，接触到了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新信息和新理念，这在当时封闭的状况下是有很多新鲜感和强烈刺激的，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在他与夫人乐黛云教授一起回国之后，恰逢深圳大学正在筹办，于是应张伟校长的邀请，乐先生出任了中文系的主任，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而哲学系暂不能成立，只好先办一个偏重中国哲学的研究机构，这便是国学研究所，由汤先生主持。国学一名，当时的人们并不熟悉，但具有家学渊源的汤先生却不陌生，民国时期的北大即有国学门，办有《国学集刊》，而矗立其间的“台柱子”便是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所以，当时用了国学之名，究诸原委，实有其缘，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就另当别说了。

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恰是当时国内的文化大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在汤先生的带领下，国学所的同仁们投入其中，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举其要者：一是创办了大型的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先后出版 4 辑，发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二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集中了一批中心城市的知名学者制定规划，对 80 年代后期国内“文化热”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与当时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 30 余所高校培训了 100 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四是较早和海外的学术界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香港的几所高校有了密切的交往；五是在古籍整理方面，参加了广东高校“岭南丛书”大型项目，并在古籍整理的电子化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当时都是借了

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国学所在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的 80 年代，也为学校的文科建设、特别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积累，为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高校的人文学术遭遇了寒流，传统学科一蹶不振，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也一度沉寂了下来，几乎陷于停顿。正所谓斗转星移、时事难料，在学院内部的传统文文化研究遇到顿挫、文史哲学科陷于生存困境之时，在市场经济活力的冲击和裹挟下，此时在社会上却悄然兴起了一股国学潮，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了复苏的迹象，国学理念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熟知。这个翻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而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学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显豁，则演绎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剧情，锣鼓铿锵、人腾马跃、各色粉墨、正谐相随，一幅好不热闹的场景，实为近代以来所罕见。

经过了 20 年的发展，国内的国学热，潮涨潮落，几度翻腾，浪花相逐，亦泡沫堆积，呈现出了远比最初的时候要复杂得多的面相，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到了今天，对国学的理解和国学之研究早已不是往昔的景象了，也已不具有解释的统一性，其边界宽泛得已经让人无话可说；无处不在的国学、无人不谈的国学，五花八门的杂乱样子，又几乎让人不忍置喙，不知从何处落脚了。清代学者凌廷堪（1755—1809 年）在论及天下学术变迁之大势时，有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耄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校礼堂文集》卷 23）而当此时刻，国学作为一种时代的表征和映照学术潮流之走向的标尺，是处在“将变”“既变”之际邪？抑或已经有了一点“天下相与安之”的苗头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之，或者采取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行动来对待之，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必强求一律，更没有必要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来，判断权完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

作为高校的国学研究，当然有它的学术持守，不能随波逐流；有它的学科规范，不应漫越无度；有它的独特责任，不必包打天下。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做自己必须做的，是从事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研究和教学工

作的高校教师的职责，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集中了文史哲三个学科门类的人马，在国学研究所和国学本科实验班的基础上，又于今年新成立了国学院，隶属于学校，挂靠在学院，实行一体两牌的互动机制，凸显出国学研究的平台性、基础性和融合性，以国学来寻求人文学科之间的内在交融和体制创新，以博雅教育为宗旨，努力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点。根据我院现有的学科优势和师资特色，新的国学学科架构，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努力寻求国学建设的突破口和国学发展的新路径，强调融合文史哲不同学科之间的力量，以凝聚起人文基础学科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为提高深圳大学文科建设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我们在学校领导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申报了“以国学为平台的人文基础学科融合与创新”项目，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作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之一，我们编选了这套“荔园国学丛书”，集中收入我院教师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著，以贡献予社会。

深圳大学地处南国，荔子飘香，别号荔园。每年的六月份，荔枝成熟，挂满枝头，又是一年丰收时，也恰临毕业季。校园里，行将走入社会的学子们，身穿蓝袍，穿行于红荔绿荫之间，构成了一幅最美的图画。我们的“荔园国学丛书”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校园美景一同诞生的，愿它像学子们一样，带着成熟，带着希望，走遍天涯。

景海峰

2017年6月5日于荔园

目 录



丛书序(景海峰)

非孟铭文试析(李学勤) / 1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官长为) / 4

东西异制

——早期中国研究新范式论纲(陶 磊) / 14

古史系统的新探索(李 锐) / 33

近年出土文献中的先秦禅让传说(彭邦本) / 39

论专制帝王的儒学情结(吕文郁) / 55

“都城”起源的初步考察(尹弘兵) / 65

商代分封制的产生与发展(徐义华) / 94

论商人不祭祀“上帝”及其宗教意义(郭晨晖) / 102

两周时期燕国与诸国的政治联姻(刘 丽) / 117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两周青铜器咀华(田 率) / 125

由故宫博物院藏“周安壶阁”印看媿妊壶的收藏源流(陈鹏宇) / 138

金玉奇缘之一

——以卷体衔尾玉龙为切入点(苏 辉) / 146

西周金文辞“濒才帝廷”解(张德良) / 153

平宫鼎铭文新考(王 伟) / 161

春秋晋国两子犯

——读清华简随札之一(郭永秉) / 165

椎与终葵

——说清华简《说命》篇的傅说形象(王 青) / 172

《傅说之命》著作时代考(程 薇) / 177

清华简《良臣》散宜生与西周散氏(陈颖飞) / 182

清华简《祝辞》浅释(韩宇娇) / 199

清华简《命训》校释一则(许 可) / 205

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牛鹏涛) / 211

清华简《越公其事》合文“八千”刍议(魏 栋) / 217

“孝子不匮”还是“雄鸷多智”

——新史料所见郑武夫人与郑庄公事考论(程 浩) / 225

“六王五伯”与“九州十二国”

——出土文献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杨 博) / 239

从帛书《二三子》论《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的本义(廖名春) / 257

屯卦卦义辨正

——兼论《周易》卦名一字表多词的现象(黄甜甜) / 269

《诗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陈 致) / 277

思孟荀礼学思想比较论纲(曹建墩) / 290

说“为”(梁立勇) / 306

唐兰先生的文字分期观和文字发生发展观(陈英杰) / 310

从“重新估价”到“走出疑古”再到“重写学术史”

——李学勤先生治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田旭东) / 323

汉简本“积正督”与《老子》十六章古义臆诂(宁镇疆) / 332

银雀山汉简《唐勒》篇章结构刍议(马 楠) / 341

“扞关右尉”印章小识(罗小华) / 345

告地策与陶瓶朱书所反映的汉代生命信仰与生死观(李 立) / 348

论汉代的辟除四科(张 欣) / 363

首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综述(牛鹏涛) / 375

后记(牛鹏涛 苏 辉) / 379

非盂铭文试析

李学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2016年夏天，笔者由于偶然的机，看到一件西周的青铜盂及其铭文的照片。因其形制、纹饰及铭文内容都有一定特点，很想做些探讨，但因偶有小恙，未能着笔。现检出当时笔记，稍加整理补充，与大家商榷。

非盂是一件形体不大的盂，高 17 厘米，口径 22.5 厘米。无盖，侈唇，深腹，腹侧原有一对环耳，垂环现已失去。口沿下饰一道蚕纹，间有小兽首。腹外饰以相对夔纹组成的垂叶纹。低圈足，饰蚕纹。观其造型，可迟到西周中期，而在纹饰方面仍有早期特征，定其时代为早期偏晚，即约当周康、昭时，应该是恰当的。

盂内有铭文 5 行共 36 字，照例依原行款隶写于次：

非曰：“异好，我隹（惟）曰

若，我王涉室事，乍（作）

器无咎多为它。异

好小子，其肇乍（作）器，乃

弋兴徯，异好自兹。”

其中“小子”二字合文。

“非曰”：“非”是作盂的器主人名。铭文记述他的指令，故以“非曰”起首。

“异好”也是人名，为非所指令的对象，其人名“好”，但不像殷墟卜辞“妇好”那样是女性。先秦男性有名“好”的，秦穆公名“任好”即可证明。笔者认为“异好”单名“好”，“异”则是该人的工匠身份，与《考工记》的“轮人”“舆人”等类似。按“异”乃是一种鼎的名称。西周早期的作册大方

鼎云“公来铸武王、成王异鼎”，异为大鼎，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有详细讨论^①。“异好”的“异”可能也指大鼎，他是世传制鼎及其他青铜器的匠师。

“我惟曰若”：“我”，器主非自称。“惟”字是加强语气的虚词。“曰”，《论语·八佾》皇疏：“谓也。”西周金文五祀卫鼎“曰厉曰”，大簋“王命膳夫豕曰趯睽曰”，二者前一“曰”字也是有宾语的动词，意即告谓。“若”，《国语·吴语》注：“汝也。”“我惟曰若”，意思就是我要告诉你。

“我王”词见《尚书·盘庚》，在孟铭中是非对周王的称呼。由此知道非是周王朝管司匠人的工官，且有较高身份，能了解王室的情况。

“𠄎”是“濒”字，通作“频”^②，《诗经·桑柔》笺“犹比也”，其义即是频数。“室”有铸造之义^③。“我王𠄎室事”，是说周王屡有铸器的任务下达。

“乍器无徻多为它”，是非对异好的要求。“徻”字见于《说文》，云：“使也。”然而这样讲的“徻”字在文献中罕见其例，古文字例子也都是“逢”字的省体^④，不过此字训为“使”，在孟铭中却是十分合适的，“无徻多为它”意即不要多制作周王任务以外的器物。

“异好小子”，是非对下属异好的称呼。“小子”一词，在当时如系自称，是表示谦逊；如称他人，则是对居下之人的口吻^⑤。

“其肇乍器”，“肇”训为始，这是非指示异好开始铸造的工作，以下“乃弋兴徻”云云则是给予异好的有利条件。

“乃”义同“其”^⑥。“弋”读为“式”，即“试”字，意思是“用”^⑦。“兴徻”的“兴”，《左传·哀公十六年》释文“谓兴发也”，以后来习用的话说，就是征调。铸作需要劳力，要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众中选取征调，这是“兴”；“徻”即“还”字，义系回归，与“兴”相反。合起来讲，“兴还”即是工役的征发和遣返。

工官非把作器工役的征发遣返的权力给予异好，这便是铭文说的“异好自兹”。这里的“兹”字，笔者推想应读为“裁”，意即裁度^⑧。怎样征发和遣返作器的劳役人员，交由异好自定，这是给了异好相当大的权力，目的显然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页。

②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42页。

③ 陈剑：《释“琮”及相关诸字》，《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④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十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

⑤ “异好小子”的“好”字照片不清，如系其他字，“异□小子”可能是合指作鼎的好及其所司的工役而言。

⑥ 杨树达：《词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

⑦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3页。

⑧ “裁”训裁度，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8页。

是要保证为周王作器的顺利进行。

如果以上所论无误，孟铭似可大致语译如下。

非说：“异好，我告诉你，我们的君王屡有铸造的任务，造器不可多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小异好呵，开始去作器吧。至于工役的征发和遣返，都可由你自己来决定。”

这件非孟的特殊意义，笔者认为可与《周礼》经文相互印证。

按《周礼·秋官》有司约一职，文云：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摯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非孟所载，正相当六约中的“治器之约”，可能由于铸鼎之事重大而“书于宗彝”，与《周礼》所说是很符合的。

补记：本文成稿后，承程薇博士检出，此孟已著录于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0536，云2014年7月出现于西安。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宫长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李学勤师早有论述，他为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①所撰“序言”提到：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当以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到春秋战国，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范围。这一阶段的历史，实际上恰好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显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时限就是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平均每年发表学术论文有4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几十部。近年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总体上来说，有两个亮点、四个突出。

两个亮点，即安徽蚌埠禹会村考古发现和清华简出土文献研究；四个突出，即中华文明探源、商周史探索、区域文化探讨、百家争鸣探究。先说两个亮点。

其一，安徽蚌埠禹会村考古发现。禹会村位于安徽蚌埠禹会区，考古探查工作始于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的王吉怀主持，2007—2011年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大约6000平方米，其中包括经过

^①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人工堆筑铺垫的大型祭祀台基、专属的祭祀通道、不同类型的祭祀坑、简易式工棚建筑和特征明显的祭祀器具等，属于一处大型礼仪建筑基址。这不仅填补了龙山文化的地域空白，而且确立了龙山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禹会村类型。根据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禹会村遗址年代距今 4100—4300 年，与古代文献所记禹会诸侯事件密切相关，对于考证古史，探讨淮河流域文明，乃至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2013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协办的“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召开，并举行了《蚌埠禹会村》考古发掘报告首发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禹会村遗址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积极可喜的认识。

其二，清华简出土文献研究。清华大学所藏这批战国竹简，是清华大学校友的捐赠，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入藏清华大学。随后，在李学勤师的亲自主持下，聘请有关专家进行清理保护，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鉴定，同时，还请北京大学专家用 AMS 质谱仪做了 ^{14}C 年代测定，加上树轮校正，结果证实这批竹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05 ± 30 年，也就是战国中晚期，它与先前发现的郭店简、上博简的时间大体相同。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统计，这批竹简包括残简在内，共有 2388 枚，整简数量当在 1700—1800 枚，其内容全部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书籍，以传统目录分类中的经、史之类为主，有 63 或 64 篇。显然，有些篇幅内容比较长，而且相当大的部分是比较完整甚至于完整无损。

第一辑以《尚书》类文献为主，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又称《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和《楚居》；第二辑与第一辑 9 篇有所不同，由一部史书组成，以分段式列有 23 章，原本无篇题，拟题为“系年”，是一部有关周代的断代史；第三辑还是以《尚书》类文献为主，包括《傅说之命》（上、中、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和《赤鹄之集汤之屋》；第四辑共收入 3 篇，《筮法》《别卦》属于“易”类方面书，《算表》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用算具。从中可以看出，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方面，早已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学术界在国际上和国内先后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集中讨论相关古史问题和文本的释读问题。

再说四个突出。

第一，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探源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焦

点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整体上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已经被大大地向前推进，由夏商周三代社会研究，进入五帝时代研究。张忠培于1994年提出良渚文化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及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认识，并且据福泉山墓地、马桥墓地、瑶山墓地的研究，进一步表述了文明社会的内涵。^①王巍通过近年来考古学最新成果着重指出，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其主要文化内涵是来自自身的发明和创造。^②同时，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明体系之中。

同时，王震中提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进入国家社会之后邦国—王国—帝国的发展模式和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代表了学术界最前沿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③

事实上，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专家在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约请李伯谦、晁福林、王震中、谢维扬、易建平平等学者撰文，对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此外，靳松安^④、向桃初^⑤、江林昌^⑥、袁建平^⑦、晁天义^⑧等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涉及黄帝、炎帝、少昊、尧舜，以及伏羲女娲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做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二，商周史探索。新材料的发现，也不断推动商周史研究持续开展。

2009年4月13日，李学勤师率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周文王遗言》，从此开启了《保训》篇研究或者说清华简研究的先河。《保训》篇作为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主要对其太子发即武王讲了两件历史传说，一件是关于虞舜的故事，另一件是关于上甲微的故事。通过二者所讲的内容，旨在阐述“中”

①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

② 王巍：《考古勾勒出的汉前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4日。

③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

④ 靳松安：《论龙山时代河洛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及历史动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⑥ 江林昌：《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

⑦ 袁建平：《论服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求索》2010年第8期；《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⑧ 晁天义：《“亲亲”与“尊贤”：前国家时代的政治遗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这个富有哲理的概念。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随后的讨论中，“中”的内涵引发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热议。据周同科的统计，主要有“中道观念”说、“司法文书”说、“地中”说、“军旅”说、“命数”说，以及“婚事”说等。^①陈民镇认为，上甲微所“假”的“中”即军队，与古本《竹书纪年》“假师于河伯”的记载相对应。^②

此外，清华简《尹至》《尹诰》和《传说之命》（上、中、下）诸篇，不仅关乎商代前期和后期的历史问题，更涉及今古文《尚书》纷争问题。

清华简中的《尹至》与《尹诰》两篇，本是密切相关的出土文献，《尹诰》又称《咸有一德》。李学勤师指出：“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讞。”^③杜勇强调失传近 2000 年的《尹诰》篇重见天日，为解决梅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证据，意义极为重大。^④虞万里则认为，《尹诰》和《咸有一德》两篇文字虽有不同，文意却有很大的关联性。^⑤不可想象魏晋时期去问一位没有见到过《尹诰》的人，他能够根据“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一句，敷衍发挥出一篇与先秦古文《尹诰》暗合的文字。

如果说他们的意见代表了问题的两端，那么，由《尹诰》篇所引发的古文《尚书》辨伪问题，随着《传说之命》篇的深入讨论，已经成为重新审视古书形成的一种趋势。李锐^⑥的两篇文章，均是利用新出简帛材料进行的文献学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殷墟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有关甲骨文的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公布，包括刚刚出版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⑦在内，也给殷商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范毓周认为，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期体系。^⑧庞小霞和高江涛认为，晚商时期商文化进入海岱地区至少通过海陆两条通道，目的应

① 周同科：《清华简〈保训〉之“中”关与婚事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陈民镇：《上甲微史迹传说钩沉：兼说清华简〈保训〉“假微中于河”》，《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③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④ 杜勇：《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⑤ 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2012年第2期。

⑥ 李锐：《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5期；《清华简〈传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⑦ 宋镇豪、郭富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旅顺博物馆编：《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⑧ 范毓周：《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是控制鲁北的海盐及保障长江下游地区的铜锡原料的北运。^①

张兴照^②从军事战略、贡纳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作了阐述。易德生尝试用异常铅来追溯锡铅多金属矿，从而追溯锡料产地^③。他认为商王朝的青铜原料运输路线可能有三条：一是北线，主要由南中条山铜矿区直接提供铜料；二是南线，主要从长江中游地区运输锡料及部分铜料，这可能就是远距离的、商王朝所谓的“金道锡行”。

其他方面，徐义华^④、黄国辉^⑤、黄天树^⑥、曹定云^⑦、常玉芝^⑧等的论文，也颇有新意。

有关西周史研究方面，殷周之际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晁福林^⑨指出，殷周之际周武王与箕子皆讲“彝伦”，表明对重构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周初彝伦的重建，使周王朝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国家的君主专制，行政管理也比以前更有成效，社会局势得以长期稳定。王进锋认为，“王臣”在社会阶层的范围里向纵深不断地延伸，直到社会的最底层，从而使得本来为贵族所有的“臣”也划归到了“王臣”的范围里，大大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⑩刘源认为，殷周时期并未真正实行过“五等爵”制，而是内外服制及侯、甸、男、卫、邦伯的诸侯体系。^⑪

清华简中的《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周公之琴舞》，包括稍后《祭公》《芮良夫毖》等诸篇在内，都涉及殷末西周初及西周中、晚期的相关史实，不少专家学者围绕着清华简集中展开讨论。其中《保训》篇开头即云：“惟王五十年。”这个“王”无疑是指周文王。李学勤师认为，其实《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何尊等金文也说文王受大命，文王晚年称王恐怕确是事实。^⑫刘国忠认为很可能文王即位之初就已经自称为王了，但并未让商人知晓。^⑬李学勤师认为《耆夜》武王征耆即指《尚书》“西

① 庞小霞、高江涛：《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

② 张兴照：《甲骨文所见商代水环境》，《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③ 易德生：《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④ 徐义华：《商代的帝与一神教的起源》，《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⑤ 黄国辉：《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⑥ 黄天树：《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丧葬制度》，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二〇一二年》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⑦ 曹定云：《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及相关问题：兼释〈英藏〉1616中另类“典”字》，《考古》2013年第9期。

⑧ 常玉芝：《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论卜辞中的“司”、“毓”》，《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⑨ 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⑩ 王进锋：《说“王臣”：兼论西周分封制的统治功能》，《人文杂志》2009年第6期。

⑪ 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⑫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⑬ 刘国忠：《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